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辛亥前后 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瞿 骏著



XINHAIQIANHOU
SHANGHAICHENGSHI
GONGGONGKONGJIANYANJIU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辛亥前后 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瞿 骏著



XINHAIQIANHOU
SHANGHAICHENGSHI
GONGGONGKONGJIANYANJIU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瞿骏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9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ISBN 978-7-5326-2949-7

I. 辛... II. 瞿... III. 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上海市—近代 IV. TU984.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9775 号

责任编辑 李 纳

封面设计 明 婕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196 000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949-7/K·654

定价:34.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2431119

教育部第五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4 年重大项目（批准号：04JJDZH007）研究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一研究院资助项目
2008 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项目资助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任

熊月之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军	马学强	宋钻友	张 剑
张晓敏	陈祖恩	金大陆	周 武
承 载	钱 杭	唐克敏	彭卫国
熊月之	潘 涛		

总 序

熊月之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袄教、锡克教、理教。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不难想象,近百年间的上海,这里是佛教的水陆法会、春节烧香、除夕撞钟、元宵彩灯、观音诞辰、龙华庙会、浴佛盛典、盂兰盆会;那里是道教的画符念咒、掐诀步罡、祈晴祷雨、驱鬼逐妖、占卜堪舆、超度亡灵,各路神仙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到铁拐李、吕洞宾、关公、钟馗、春申君、黄道婆、施相公、秦裕伯、陈化成，一路走来。一会儿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开斋节、宰牲节；一会儿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感恩节、圣餐礼拜、结婚礼拜、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一会儿又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普林节、修殿节、除酵节。这边是留蓄长发、上衣至膝、戴锡佩剑的“红头阿三”锡克教徒；那边是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白衣秀士”祆教信徒；再那边则是壁挂葫芦椰瓢、戒烟戒酒、大摆素斋的理教信众。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

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

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landers,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那么多的多元的存在,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

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蕴如此丰富、情况如此复杂的城市,正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极好对象。

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厅、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买办、医生、报人、律师、科学技术工作者、舞女生活的研究;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英美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的研究。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上海城市生活,从时间上看,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年开埠以前,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普通沿海城市,与宁波等一般沿海城市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949年5月,即通常称为近代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年5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第四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

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则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来自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欧亚研究所,也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与上海档案馆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多次举行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值此项目完成之际,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谨向各位课题组成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年12月24日

注 释

-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第 70 页。

目 录

总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报纸与革命	17
第一节 “震惊气盛”之消息——制造上海报	18
第二节 搅动天下视听——阅读上海报	26
第三节 “何种激烈手段对付皆所不辞”——报馆之毁	34
第二章 追悼会与革命	58
第一节 “振大汉天声”之后——英雄系谱书写与追悼会	59
第二节 淘洗与压抑——烈士的生成	64
第三节 威权与博弈——追悼会的现实情境	73
第四节 潜流与重现——烈士与革命历史记忆的传承	80
第三章 生意与革命	101
第一节 复相的呈现——生意中的伟人将帅	102
第二节 在商言商——生意与商家	113
第三节 选择与放弃——生意与消费大众	122

第四章 日常生活与革命	155
第一节 赴上海之路.....	156
第二节 失序的上海.....	163
 结论	180
 附录 入上海与居上海——论清末士人在城市的私谊网络 (1895—1911)	191
 征引、参考文献	225
 后记	242

导 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上海与辛亥革命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以往史家一般会从三种路径入手来进行讨论。其一是“事件史”路径，此种路径将辛亥革命视为一个发生—发展—消亡的整体性大事件，上海起事只是整个大事件因果链条中的一环。自 1912 年郭孝成编辑《中国革命纪事本末》^[1]始，很多关于上海与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比如几乎所有的辛亥革命通史著作以及从民国到当下的各种历史教科书所遵循的都是这一路径。在此路径下，上海起事被化约成一个大事件中的小事件，其首先从属于辛亥革命的“各省响应”，其次是“各省响应”中的“江苏光复”。

其二是“革命史”路径。由于上海并没有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也不是革命中激战最酣、死亡最多的所在。相反在起事之前，道台、县令等已经弃署丢印，落荒而逃，几乎留下了一座空城给革命党，巡警、商团等也已纷纷反正，除了攻打制造局费了一些功夫，其余几未费吹灰之力。《申报》评论就说：

上海之失守也，且不以夜而以日，以三十余人执旗入城，而大局已定。觅县令则已奉让矣，询道台则已出走多日矣。于是革军遍贴告示，市面安静如常，若不知有改革事者。〔2〕

但另一方面，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其作为辛亥革命史叙述中的重要环节不可或缺，沪军都督陈其美也是日后国民党党国体制中赫赫有名，并设有专门纪念日的“革命伟人”，加上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发生的“二次革命”均可在上海史中写上一笔。由此，在这一路径下，上海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轮廓较之“事件史”路径似乎更明朗了一些。

其三是“现代化史”路径。采取此种路径的很多研究成果在摆脱了“革命史”框架的某些限制后，发现原来辛亥革命并不是单靠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方能取得成功的，其中不乏张謇、雷奋、汤寿潜、黄炎培、李平书等江浙立宪派的功劳。而他们在“现代化史”路径的投射下恰恰都是所谓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先驱，与上海也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于是，上海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就又多了不少可供继续讨论的余地。〔3〕

其实无论是“革命史”路径还是“现代化史”路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最终目的”的预设悬挂在那里。同时，“目的论”往往特别强调“跨越”性和“阶段”性，在它们那里，辛亥革命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跨越和全新的阶段，从而能够突破“事件史”路径的“发生—发展—消亡”的简单因果链条，揭示出不少可以论证其“目的”的历史面相。不过，也正因为其揭示的历史面相都是为其“目的”服务的，那些不符合其“目的”的历史面相就不免被遮蔽或扭曲，从而也无法对辛亥革命与上海的关系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

因此，要对辛亥革命与上海城市的关系作一新的讨论，就必须

既将上海从“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江苏光复—上海起事”的后果链条中解放出来,也必须把辛亥革命拯救出将其后见之明地看作一个伟大跨越和全新阶段的“目的论”窠臼。当然,同时也不宜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告别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以新的路径来重新书写上海城市与辛亥革命互动碰撞的历史。在这一大背景下,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辛亥前后上海的各类公共空间如何塑造了这场革命?而革命又怎样影响了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轨迹?

本书将从政治社会史的路径出发,证明从上海各类公共空间生产出来的真假新闻、小道消息、仪式过程、纪念活动、生意买卖等都参与塑造了这场革命,在此过程中,城市公共空间与革命激烈碰撞,急剧互动,并被革命深深影响。同时,上海也是革命时一片混乱中各地逃官、难民的汇集之处,城市公共空间见证着他们和上海市民在革命中的经历和遭遇。总之,上海的城市公共空间既是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各类人群经历重大政治变迁的集中缩影,更是清末民初城市公共空间转型的代表个案之一。

本书将主要围绕清末民初上海的开放私园、街头、店铺、茶馆、戏园、车站、码头等公共空间展开,在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碰撞、互动、影响的主线贯穿下,研究范围包括革命与报馆舆论、追悼会与革命烈士、革命与生意、革命与日常生活等内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事开始,到 1913 年二次革命结束。这一时期,革命脱胎于 1901 年后上海所发生的大变化,又为上海之后的转型添加了新的变量,由此形成了对其各个方面的强大冲击,导致了城市公共空间政治化的极大加强。通过这一研究,笔者希望能开辟一个新的窗口,以更好地理解 20 世纪初上海城市的政治、社会与文化。